

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历程、经验与启示

——兼论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

文/凌胜利 蒯莉

特朗普上任以来，奉行“以实力谋和平”和“以结果为导向”的战略理念，在很长时期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并未明确表态，更多是关注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领域问题的解决（如贸易问题、朝核问题）。不过在历经一段时期的战略游离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也开始逐渐清晰起来。2017年底，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对手”，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基本确立。2018年3月以来，中美在贸易领域的摩擦趋向激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更加强硬，如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再次回归到以美国的战略调整为主导的传统路径呢？由此引发的问题是，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中国对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能力增强，这种能力如何有效落实？回顾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主要是以美国为主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可以视为冷战后中国主动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塑造的重要尝试。对于未来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而言，中国如何在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也就使得对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经验与问题进行反思很有必要。

中美战略关系塑造的历程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中美之间是否产生崛起国与挑战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在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正是基于对中美关系趋向恶化甚至爆发冲突的担忧，中方主动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可以视为中国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塑造的尝试。回顾这一历程，对于未来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具有一定启示。

对于中方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美方如何认知与回应十分关键。尽管中国一直推动以“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塑造，不过美国官方的态度却不断发生变化，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12年2月首次正式提出到2013年6月的中美领导人安纳伯格庄

园会晤；第二阶段是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后到2014年11月的北京习奥会；第三阶段是2014年11月的习奥会后到奥巴马任期结束。

第一阶段为观望期，美国官方对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持谨慎欢迎态度，简单地把新型大国关系理解为中美规避冲突，加强合作。与中国官方在战略层面对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高度重视不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倡议持谨慎态度。第二阶段为试探期，美国在对新型大国关系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对新型大国关系展开了更多的战略试探，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也逐渐转向消极。与此前美方偶尔提及新型大国关系相比，美国官方更多强调“新型关系”的概念，与此前的态度相比有所退缩。第三阶段为冷淡期，美国官方基本不再提及“新型大国关系”，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质疑增加。美国官方也基本不再对新型大国关系做出直接回应，只是偶尔提及“新型关系”。究其原因，美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投行、提出“亚洲新安全观”以及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等举措产生了质疑，认为中方为了自己的核心利益要将美国排除出亚太地区，因而对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意图更加怀疑。

2017年1月，特朗普入主白宫，中美关系进入新的阶段。2018年以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基本都不再提及“新型大国关系”。回顾中美两国官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可以发现，尽管中国领导人比较积极地阐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与构建路径，但美国领导人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回应不多，这体现了两国在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方面存在分歧。虽然中美两国在“不冲突不对抗”方面具有一定的共识，不过总体而言，两国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分歧多于共识。

中美战略关系塑造的经验

基于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双方的战略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的构建。对于未来中美战略塑造而言，需要注重凝聚战略共识、承认战略能力、增进战略互信、协调战略利益和管控战略分歧五大关键问题的处理，这也是决定中美战略关系塑造成败的重要经验。

（一）凝聚战略共识

较高的战略共识是两国战略关系塑造的基础。回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历程，不成功的经历与两国的战略认知分歧显著密切相关。中美双方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战略目标、战略利益、战略内涵、战略路径和战略思维五个方面。

一是战略目标的分歧。中美两国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存在分歧。中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是中层目标，即中美两国彼此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合作共赢”是高层目标，设定为中美合作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美方愿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是基于美国霸权维护，希望规避中美冲突的同时通过一系列规则构建来约束中国，减少中国崛起对其霸权地位的冲击。二是战略利益的分歧。在战略利益方面，中美之间的分歧也尤为明显，集中聚焦在对“核心利益”的界定和相互认可两方面。三是战略内涵的分歧。美方认为中方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模糊，原则性较多而缺乏实质内容。四是战略路径的分歧。中国更多从战略层面探讨新型大国关系，以战略引领为主，侧重于先确定战略框架，培植战略互信，然后再指导各具体领域的战略执行；美国更多关注如何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具体问题，以问题导向为主。五是战略思维的分歧。战略思维深受战略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中美之间战略思维的差异深刻地影响了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与构建。

（二）承认战略能力

美国之所以不愿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不愿正视中国实力的增长和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现实。虽然美国各界并非没有意识到中美实力差距的变化，但基于霸权思维，美国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与其旗鼓相当的国家。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但国际影响力并未相应增强，而要获得美国更多的尊重，需要争取美国对中国战略能力更多的承认。中国战略能力的增强主要基于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创建。而美国的战略能力除了依靠自身实力外，庞大的联盟体系和一系列制度性权力、软实力是其战略能力的重要来源，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对美国战略能力的影响不宜被过分夸大。从中美两国战略能力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中美战略能力差距会有所缩小，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需要基于中美战略能力的变化和相互承认，进而才能形成稳定的战略关系。

（三）增进战略互信

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的不足严重地影响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与构建。鉴于中美之间存在崛起国与守成国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意识形态分歧，要建立高水平的战略互信十分困难。不过构建中美战略互信也并非没有可能，中美之间不奢求构建美国与其盟国那样基于价值观共识的战略互信，但可以构建减少战略误判、增加对彼此行为预期的工具性互信，这也能够为中美战略关系形成一定的兜底作用。增进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一是要增加相互交流与沟通，通过制度建设来增进彼此的相互信任；二是增加彼此的战略清晰度，促进战略意图的相互良性认知；三是在解决两国重大分歧的议题中不断培植战略互信。

（四）协调战略利益

无论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还是中美战略关系塑造，都需要协调好双方的战略利益。如何协调好中美的战略利益，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共同利益与冲突利益之间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合作，变规则竞争为规则合作。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与美国并不存在完全对立的秩序竞争，两国可以在变革和完善现有规则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二是要继续推动中美务实合作，深化和拓展合作领域。尽管当前不断加剧的经贸摩擦成为两国关系的矛盾点，但不能因此就认为经贸问题完全成为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影响因素。中美经贸合作依然可以在双边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如何妥善处理好两国的贸易关系，通过增益调整而非零和博弈的视角来处理两国的贸易摩擦。三是要处理好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与冲突利益并存是常态，因而如何求同存异，进而聚同化异是中美战略稳定的重要保障。共同利益固然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但对冲突利益的妥善处理才能够维持中美战略稳定。

（五）管控战略分歧

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与稳定还离不开对战略分歧的管控，这些分歧既有可能来自双边关系，也有可能来自地区、全球或第三方因素。

在双边关系中，中美战略分歧主要集中在国际地位、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贸易问题等涉及双方重大利益的议题。这些问题会单独或以不同组合形式发酵，在中美关系中产生巨大影响，其解决更多依赖于中美双方的沟通。除此之外，中美关系日益具有全球性和战略性，中美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冲突不断增加，亚太地区层面的主导权竞争和全球层面的规制、秩序竞争已逐渐成为中美两国的重要战略分歧和潜在危机。在全球层面，中美在一些领域的竞争激烈致使两国的战略分歧也有所增多。显然，由于中美战略分歧成因多样、领域广泛，如何解决中美战略分歧需要从长计议，需要双方务实地直面问题，积极地增进

沟通，有效地逐步解决。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开局相对良好，不过随着2017年年底美国对华战略的再定位，中美关系开始进入新一轮摩擦期。回顾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在贸易问题、朝核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地区战略等方面，中美竞争明显加剧，美国对华不断加强施压力度，甚至不惜制造边缘性危机进行战略敲诈，给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竞争加剧的原因实际上与两国的战略基础松动有关，这也使得重塑稳定的中美战略关系很有必要。关于如何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再塑造，由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已经告一段落，能否以新型国家关系来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新定位不乏争议，毕竟新型国际关系无法突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重新定位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对华战略争论的结果。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实力走向使得美国对华战略防范心理加强，加之两国竞争有所加剧，特别是在地区和全球规则与影响力方面，这促使美国对传统的接触-遏制的对华战略手段进行反思，美国国内战略界在强硬制华方面具有较大共识。总体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会有所加剧，无论是竞争的广度还是强度都比以往更加明显，这也使得思考未来中美战略关系如何塑造很有必要。

一是尽量维持战略稳定。由于美国对华战略总体趋向强硬，使得中美关系中竞争性的一面更加突出，加之特朗普的政策风格具有很强的冒险性，边缘政策特点显著，这就使得中美两国的战略稳定面临更多挑战。如何实现中美关系的斗而不破、维持两国的战略稳定至关重要。尽管中美战略竞争近年来有所加剧，但两国对于规避军事冲突还是有着很强的战略需求与共识。不过除了避免军事层面的冲突外，中美两国对于战略稳定的理解与诉求存在差异，这也使得两国的战略稳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基于上述情况，中国促进中美战略稳定要注意四点。其一是在坚持维护核心利益的同时，也要与美国保持密切的沟通，避免危机的升级和失控，进而损害战略稳定。其二是要加强战略清晰度，突出“红线”意识，对于可能危及中美战略稳定的重要议题，中国要较为清晰地画出“红线”，警醒美国不要犯机会主义错误，防止中美战略竞争失控。其三是加强中美高层沟通，发挥稳定器作用。特朗普偏爱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电话外交”，注重双边交往和高层沟通。近一年多来，中美高层，特别是元首之间的交往为两国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四是要注意到中美之间军备竞赛的可能性及其危害。

二是加强战略分歧管控。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中美之间的战略分歧管控更加紧迫。管控中美战略分歧，首先需要加强战略沟通，就双方的战略分歧展开坦率的讨论，了解彼此的战略诉求，不断加强协调，缩小战略分歧。其次要加强危机管控的制度建设。目前两国在最为敏感的军事危机预防与管控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合作制度，不过这些合作制度还远远不够，存在军事合作制度的覆盖面还相对有限、第三方引发危机预防制度不足等问题。最后要对中美双方在战略目标、战略路径、战略利益、战略思维等问题上的分歧进行精细管控。在战略路径上要适应特朗普政府的问题导向，解决关键议题中的分歧是管控中美战略分歧的重心。

三是有效协调战略利益。由于美方将中国定义为“对手”，并将大国竞争视为美国的首要威胁，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呈现全面性、长期性的特点，如何加强两国战略利益的协调成为塑造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因素。对于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协调而言，一般可以分为大国协调和制度协调两种。由于特朗普政府偏好双边模式与互惠交易，中美之间的“双边大国协调”在两国战略利益协调中发挥首要作用。针对不同议题，中美双方可以灵活采用不同的协调方式，尽可能地实现两国利益的协调，防止两国用武力手段取代外交手段来解决战略利益冲突，避免中美两国滑向“修昔底德陷阱”。

结语

中美建交40年来，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整体上更多以美国为主导，美国政府更迭对于中美战略稳定的挑战从未消失。特朗普执政以来，因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这也使得中美战略关系面临着再塑造的问题。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并非另起炉灶，而是需要汲取先前的经验。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态势短时期内难以缓解，限制特朗普政府的机会主义和交易主义外交政策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已成为当务之急，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确保中美战略稳定，避免两国关系滑向“修昔底德陷阱”。总之，促进中美战略稳定符合两国利益，也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战略关系的再塑造。中美战略关系再塑造的关键还是要有较为细致的规划、较为充分的沟通，不断凝聚双方的战略共识，尽量维持战略稳定，加强战略分歧管控和有效协调战略利益。^⑤

（凌胜利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郦莉系外交学院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摘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5期）